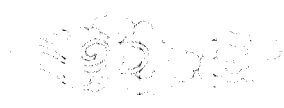




旷世大儒—— 顾炎武



陈祖武 朱彤窗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旷世大儒
——
顾炎武

陈祖武 朱彤窗
◎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世大儒——顾炎武/陈祖武, 朱彤窗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旷世大儒)

ISBN 7-202-02701-1

I. 旷… II. 陈… III. 顾炎武-传记 IV. B2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1893 号

丛 书 题	旷世大儒
书 名	旷世大儒——顾炎武
作 者	陈祖武 朱彤窗 著
责任编辑	李大星
美术编辑	马少华
封面设计	李颖明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53000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7-202-02701-1/K·661
定 价	17.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

在 2000 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 2000 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力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

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蠹”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胜出一筹的“术”。这种“术”对“人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儒，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说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学说或曰证明他的学说中，“人”的成分更为浓厚。因此，这时的儒，更有纯粹意义上的“学说”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这一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地尊为“子”，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子”得不那么坚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向往的周朝。大一统的天下，确乎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这时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领域里“君临”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宜乎其之成为“教”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思想发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即不能不有一个玄化的阶段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邃密、严格的过程。当然，这种过程究竟对儒之发育、发展有什么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义，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勾勒，虽然便于把握脉络，却也不无偏颇，比如，在若干阶段之间，其实仍然存在重要的观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余，是不应当将其遗漏的。

至于所谓“新儒学”，当是结合西方哲学的产物，其实与我们这里谈的儒发生了游离，因此不再置喙。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之思想领域，向有儒、释、道三

足鼎立之说、之实。此言或许不谬。但是，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所谓释、道，虽然一为舶来，一属本生，然归其本旨，其实不过只是儒在他界的补充、对应而已。

回到原点。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人的规模作为定位。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此兄弟二人为一种）、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当然，这些人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一番殚思周折的。

丛书没有采用聘请某位学界前辈担纲主编的惯常定势，虽然这样做颇可省心和藏拙。最终的办法，是采用逐个地确认各传主研究的个中之人，然后酌定撰写作者。这当然是费力又未必讨好的办法，但于责任编辑的责任，则或许颇有会心的体验。

应当说，在丛书选题创始之时，原有统一的撰写体例和设想。但由于各个传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时期史籍对不同传主记载的详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对各个传主的不同理解、阐释，于是在风格、处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面，十种传记之间是颇有一些差异的。前贤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许，这种种不同，才或者能从诸多个侧面体现出斯儒的发育、发展经历，体现出这些旷世大儒的韵味、风采和人格吧。

编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前 言

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风起云涌、才人辈出的时代。顾炎武就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卓然大儒。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奇学博，志在天下，以其继往开来的杰出业绩，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

顾炎武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学者，承宋明理学衰微之后，他深得晚明实学思潮熏陶的裨益。一生为学，始终抱定经世致用宗旨，以严谨精勤的学风和朴实的经验归纳方法，广泛涉足于经学、史学、方志舆地、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宏富的成就，留下几近五十种的宝贵著述。所著《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等，宛若一座无比厚重的丰碑，昭示了历史演进的轨迹，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顾炎武崇实致用的治学精神，严谨绵密的考证方法，以及他对广阔学术门径的开拓，影响一时学风甚巨，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亦显示了深远的历史作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音韵文字学之所以能够从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国，顾炎武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学术思潮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的转化过程中，作为一个开风气者，顾炎武的历史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中国学术界有个好传统，讲究道德、学问、文章的统一。古往今来，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人生境界，几多儒林中人，潜心问学，甘淡甘贫，视名利若粪土，为学术而终身奋斗。

顾炎武一生，将此三者融为一体，执著追求，终身以之，成为数千年儒林的楷模。他操志高洁，人格傲岸，时至今日，三百年过去，依然具有历久不衰的精神震撼力量。为他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缅怀这位三百年前的旷世大儒，就是为了从顾炎武的学行和思想中寻求可贵的历史借鉴，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以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祖武之治清代学术史，即自读顾亭林先生书起步。二十余年间，虽亦写有一二篇读书札记，然于亭林学行，实知之太少。原拟一如前辈学者赵俪生教授，俟晚年读书稍多，再去对亭林学行进行梳理。故而近十年间，有关顾亭林先生学行的文字，几乎不写。九八年初，承河北人民出版社古籍室主任李大星先生不弃，约撰顾亭林传记。虽几经婉拒，李先生犹错爱不减，实令祖武进退维谷，无可奈何。所可庆幸者，恰逢已故王冀民教授之大著《顾亭林诗笺释》由中华书局出版。王先生之遗著，系先生于顾亭林诗及学行潜心数十年研究之所得，原原本本，信而有徵。拜读再三，久蓄胸中之亭林学行疑问，得王先生指点而多获释然。有王冀民先生之力作为据，此时去撰写顾亭林小传，自可较之先前踏实许多。然而毕竟亭林先生行奇学博，祖武至今日犹未明白者尚多，以下所述，依旧有不少未得要领之处。就权且充一阶段性作业，请读者诸君指教吧。

亭林小传结撰过半，承苏州大学周可贞博士盛谊，远道颁赐大作《顾炎武年谱》。顾亭林学行研究得此新著，无疑将会是一个有力推动。前辈哲人云，“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信然！

同学诸友，梁君勇、袁君立泽、曹君江红、林君存阳，不惟切磋论难，匡我不逮，且为本书依次分撰第十一至十四各章。集

体劳作，增色多矣。

陈祖武 谨识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东潘家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	[1]
一、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	[1]
二、满汉文化的剧烈冲突	[6]
三、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满 汉文化的合流	[18]
第二章 晚明实学思潮的熏陶	[26]
一、“士当求实学”的家训	[26]
二、理学在晚明的衰微	[29]
三、经世思潮的兴起	[33]
四、晚明的西学输入	[37]
五、投身实学潮流	[41]
第三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44]
一、弘光授官	[44]
二、乙酉四论	[46]
三、苏州从军	[50]
四、昆山之难	[52]
五、隆武遗臣	[55]
第四章 歧路彷徨 流转四方	[59]
一、远游之想初萌	[59]

二、被迫剃发	[61]
三、奔走大江南北	[63]
四、移居神烈山下	[68]
第五章 陆恩案发 初陷囹圄	[72]
一、陆案缘起	[72]
二、苏松入狱	[74]
三、重返南京	[77]
四、孤踪疑影	[81]
第六章 只身远游 吊古伤今	[86]
一、北游原因	[86]
二、首途胶东	[88]
三、淮北大雨	[91]
四、遍游齐鲁	[93]
五、幽燕怀古	[95]
第七章 南北往返 风尘仆仆	[100]
一、江上烽火	[100]
二、频谒明陵	[102]
三、吴门度岁	[105]
四、南下浙江	[108]
五、掉头北去	[110]
第八章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112]
一、西游秦晋	[112]
二、《明史》冤狱	[117]
三、置产章丘	[121]
四、垦荒雁北	[126]
五、刻书淮安	[130]
第九章 莱州祸起 再陷囹圄	[134]

一、京中闻祸	[134]
二、《忠节录》案	[136]
三、济南入狱	[140]
四、亲友搭救	[146]
五、《赴东》诗史	[150]
第十章 以游为隐 关山共老	[155]
一、初拒修史	[155]
二、三藩乱中	[158]
三、再拒鸿博	[162]
四、卜居华阴	[167]
五、死而后已	[170]
第十一章 顾亭林致潘次耕书札考证	[176]
一、从游前诸札	[176]
二、从游期间诸札	[184]
三、鸿博特科及其后诸札	[192]
第十二章 《广师》杂识	[208]
一、撰述缘起与成文时间	[208]
二、《广师》十贤学行述略	[216]
三、虚怀若谷 相得益彰	[227]
第十三章 不朽的学术巨著《日知录》	[233]
一、《日知录》纂修考	[233]
二、社会政治思想	[244]
三、经学思想	[251]
四、史学思想	[258]
五、文学思想	[261]

六、务实学风	[266]
七、《日知录集释》的纂辑	[275]
第十四章 顾炎武礼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282]
地位	
一、明道救世的礼学思想	[282]
二、顾炎武礼学思想在当世的反响	[294]
三、清廷与儒臣的回应	[304]
四、“礼学即理学”思想的定型	[312]

第一章 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

顾炎武生当明清鼎革。他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1682年2月14日）病逝，享年七十岁。顾炎武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大儒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

一、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

十七世纪的中国，明亡清兴，王朝更迭，形成中国古史中又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从广义上说，明清更迭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人据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其腐朽性亦越发显现出来。及至明神宗万历之时，朱明王朝已入末世。其间虽有张居正十年（1573—1582）的锐意革新，然而

颓势已成，不可逆转。天启、崇祯两朝，更是江河日下，犹如痼疽积年，只待溃烂了。

土地兼并，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它的晚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明末，不惟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更有官庄的肆意侵吞。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身上，既有私租的榨取，复有官府繁苛赋役的重压，而辽、剿、练三饷的加派，则更属中国古史中所罕见的虐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御史郝晋上疏，对加派的苛酷惊叹道：“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①在重重压榨之下，人民生计荡然。崇祯末年，自江淮至京畿的数千里原野，已是“蓬蒿满路，鸡犬无声”。^②

同经济的崩溃相终始，明末政治格外的腐败。阉夺弄权，士绅结党，贪风炽烈，政以贿成，一片亡国景象。明神宗在位四十余年，蛰居深宫，侈糜无度。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一手障天，祸国殃民。魏氏党羽，推行恐怖政治，黑暗腐朽，无以复加。崇祯帝当政十七年，尽管孜孜图治，然而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因此，崇祯一朝，事事仰承独断的结果，不惟于颓局无补，反倒使谄谀之风日长。这样一个腐朽已极的封建专制政权，理所当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

正当朱明王朝积弱待毙之际，地处我国东北的建州女真崛起。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兴兵以来，短短半个世纪间，雄据辽沈，虎视关内。皇太极继起，挥师频频叩关，出

^① 《明史》卷78，《食货二》。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

没于辽东、辽西、河北，乃至京畿一带，成为终明之世不得摆脱的忧患。而置朱明王朝于死地的，则是无路可投的农民大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白水农民率先举起义旗。星星之火，倏尔燎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将腐朽的朱明王朝埋葬。但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政权没有能够得以巩固，入据北京仅仅四十余日，便又匆匆西去。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为拥兵西进的满洲贵族所攫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而只是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

清王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封建政权，自顺治元年（1644年）建立，迄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经历了整整四十年的动乱。

顺治元年，满洲贵族的入关，改变了明末阶级力量的结构，使之出现了新的组合。在北方，曾经受到李自成农民军严重打击的地主阶级，以吴三桂降清为标志，很快与满洲贵族合流。而在张献忠农民军所扫荡的南方，地主阶级亦纠集武装，对农民军进行拼死反抗。未曾受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江南官绅，则于同年五月在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试图与满洲贵族“合师进讨，问罪秦中”。清廷作为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方面于顺治元年颁发圈地令，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的所谓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以确保满洲贵族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使“满汉分居，各理疆界”。另一方面，则在不与圈地冲突的前提下，明文规定保护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于顺治二年宣布，因战乱出逃的地主，返乡之后，准给故业，任何人不得霸占，否则将以“党寇”惩处^①。就全国范围而言，顺治之初，基本上是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条；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辛巳条。